



新儒学与新世纪

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
新世纪
的回顾与前瞻

彭国翔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儒学与新世纪

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
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彭国翔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彭国翔
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202-04890-0

I. 儒… II. 彭… III. 儒家—研究—中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165 号

丛 书 名	新儒学与新世纪
书 名	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
著 者	彭国翔

责任编辑	李剑霞 李成轩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79 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4890-0/C·12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新儒学”在英文里有两个不同的用词，一个是“Neo-Confucianism”，主要指中国宋元明清时代以及同时期日本、韩国等地的“新儒学”；另一个是“New-Confucianism”，则是指20世纪以来的“新儒学”。就中国而言，宋元明清的“新儒学”，其“新”主要表现为在批判、排斥佛老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吸收了佛教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资源，对古典儒家的经典和思想作了新的诠释与发展，从而使儒学获得了适合近世社会文化的新的形态。20世纪以来的“新儒学”，其“新”主要表现为“吸取”但不是“批判、排斥”西方的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立足于儒学基本的价值立场，谋求使儒学获得现代的发展。现代的“新儒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如何充分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因素而使自身在“未始出吾宗”的情况下获得“创造转化”与“综合创新”，正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基本课题。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现代新儒学”往往被等同于所谓“海外新儒学”。事实上，所谓“海外新儒学”，其实本来根源于大陆，可以说，海外新儒学是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在海外的开花和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儒学在中国大陆也得以重新发展。而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的逐渐发展，既有“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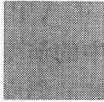
外新儒学”的影响，又是儒学传统自身在中国大陆“枯木逢春”之后自然抽发的“老树新枝”。“海外新儒学”固然不是铁板一块，大陆新儒学的发展也已成多元并进的面貌。不过，总体来说，在基本的价值关怀与立场方面，整个中文世界的“新儒学”之间是“所异不胜其同”的。至于在基本的价值立场与关怀之上发展出不同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实践，在儒学传统中则是一贯如此，自然而然的。

儒学传统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儒家学者的思考从来都不是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思辨。面对时代提出的种种课题，每一个时代的儒家学者总会提出自己的因应之道。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固然是既有“思想世界”又有“历史世界”，其“造论立说”与其“经世致用”相与表里，20世纪以来整个中文世界“成一家之言”的儒家学者，无论是侧重“究天人之际”而从事理论建构的哲学家，还是侧重“通古今之变”而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其实同样也都拥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与时代始终是息息相关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新的世纪，总会产生出遵循孔子所谓“因革损益”之道而“与时俱进”的新的儒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新儒学与新世纪”丛书，反映了当代一些新的儒家学者对于新世纪中各种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可谓适逢其时。出版社盛情邀我作序，感其雅意，故略缀数语于上。

陈 来

2009年5月31日



导 言

本书以“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为主题，由“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定位”、“方法与成果的检讨”、“当代儒学的课题与人物”以及“儒家传统的政治哲学资源”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定位”包括五篇文章。第一篇“儒学复兴的省思——缘由、问题与前瞻”，原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2月18日第35版，是应《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之约撰写的一篇专号文字。该文在回顾现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命运之基础上，对晚近所谓“儒学复兴”现象的缘由、问题与前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观察。第二篇“为道与为学——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原刊于台北《鹅湖》月刊1999年第9期“孔子思想与世纪之交”专号，大体反映了笔者对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及角色定位问题的思考。依笔者之见，对儒学在当代时代由于种种限制所可能引发的异化危险，当代儒者尤其儒家学者自然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与自觉，但“道”与“学”之间恒久的内在张力以及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均不足以从根本上扼杀儒学生命的活力，在既定的存在结构中尽性立命，从来都是儒家精神的体现。第三篇“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建构”，原刊于《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最早是2005年底提交给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



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该文将儒学的发展放在全球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主要介绍了英语世界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对于目前儒学发展的参与和贡献，并对其间彼此的错综和同异有所分析。第四篇“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 21 世纪的儒学”，最初刊于《孔子研究》2000 年第 3 期，是笔者 1999 年 8 月参加在兰州举办的“21 世纪的儒学与儒商学术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后来全文收入 2001 年《中国儒学年鉴》创刊号。该文介绍了儒学研究在英语世界中的演变以及最新的动态，由此在全球的视野中对儒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第五篇“宗教对话——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原刊于 2006 年《孔子研究》第 3 期，随即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6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同时亦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 年第 6 期摘录。该文在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内涵进行再诠释的基础上，指出了儒家传统固有的宗教性和对话性，进而强调了儒家传统在将来全球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中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提供其独特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第四、五篇由于关涉儒家传统的宗教性问题，曾经收入笔者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但由于同时也构成“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定位”这一论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也一并收入本书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方法与成果的检讨”包括五篇文章。第一篇“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原刊于 2003 年《江汉论坛》第 7 期，是应编辑之约撰写的笔谈文字之一，刊出不久即为《新华文摘》2004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该文是在中文世界刚开始对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群体性反思不久时提出的个人看法。第二篇“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以《有无之境》为例”，是 2006 年 12 月笔者参加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省与未来前瞻”国际

学术研讨会时提交并宣读的论文，该文在区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如何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两个不同问题的基础上，以陈来先生北京大学新版《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为例，认为当前以及将来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具备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这三方面的自觉。在对这三个自觉的内涵进行阐释的同时，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建构”之间的关系，该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可以视为对“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中笔者观点的进一步发挥。第三篇“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是应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之约为《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思想史”专栏撰写的论文。撰文期间笔者恰于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亦顺便宣读于2007年5月东吴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儒家哲学的典范重构与经典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前两篇文字的继续，该文应当说是笔者对“如何理解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如何理解20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以及“中国哲学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方法论考虑”等问题的较为全面的反省。该文首先交代写作的背景与所要探讨的问题，表明笔者撰写此文的用意；其次论证并指出，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比、分析了“援西入中”的正、负两种模式及其特点，具体说明了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不同方式及其不同效果；最后总结全文论旨，再次指出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



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总之，这三篇论文代表了笔者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看法。第四篇“20世纪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原分上、下两部分刊于《哲学动态》2003年第4、5期，对2003年以前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宋明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介绍和检讨，并提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考虑的若干问题。第五篇“当代中国的阳明学研究：1930~2003”，原刊于《哲学门》2004年第1期，但其实最早却是一篇英文稿，于2003年6月刊于美国出版的“*Dao: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卷11第2期。英文版有篇幅限制，中文版则有所扩充。该文对1930到2003年间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检讨，在此基础上，也同样提示了进一步推进阳明学研究所需要思考的问题。总之，如论题所示，本书第二部分的五篇论文恰好可以分为两组。如果说作为第一组的第一篇到第三篇主要反省20世纪以来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那么，作为第二组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则主要检讨“中国哲学”研究中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研究到2003年为止的主要“成果”。

第三部分“当代儒学的课题与人物”包括七篇文章。第一篇“道德与知识：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发生学解说”，曾于2000年6月刊于《原道》第6辑，是由儒学发展史的内在理路出发，从道德与知识的关系这一视角来解释现代新儒学的发生。该文虽然刊于2000年，但其实却是笔者1991年的作品，也是笔者关于中国哲学的第一篇文字。第二篇“以史证经与以史证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原刊于2002年1月3日第23版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是应编辑之邀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在介绍钱穆先生两部考证学杰作的基础上，以目前学界的动向为背景，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应有态度以及学术与思想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三篇“牟宗三哲学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概念——从中国哲学自身的演进来看”，原为笔者1998年9月参加在

山东济南举办的“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五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时提交的论文。和“道德与知识：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发生学解说”一文一样，该文撰写时在方法和取径上颇受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中提倡的“内在理路”说的启发和影响，力求在中国哲学发展自身的脉络中来定位牟宗三哲学“两层存有论”的基本架构及其“自由无限心”的核心概念。第四篇“牟宗三早年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最初曾提交于2005年9月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6月则正式刊于台湾的《清华学报》新36卷第1期。迄今为止，学界对牟宗三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哲学家来处理的。但是，牟宗三一生其实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决非躲在象牙塔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对关乎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问题，他往往都有深入独到的观察。有些问题贯彻其一生，有些问题则对应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构成当时知识分子群体讨论的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的农村问题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的对象，牟宗三也在1934年和1935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一整套看法，成为30年代关注并探讨中国农村问题的知识人群中的一员。如今看来，牟宗三的许多真知灼见尚在当时农村建设运动的知名人士如梁漱溟、晏阳初之上。可惜的是，80年代以来，无论在牟宗三研究领域还是在有关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领域，这些文章都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考察牟宗三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既可以使我们了解牟宗三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认识牟宗三在哲学之外其他方面的关怀和成就，还可以扩展我们对于30年代中国农村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笔者的该篇专论，不论对于牟宗三研究还是19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都不无补白之益。而除此补白之外，笔者撰写此文更在于要探讨牟宗三的政治社会思想，这一方面同样是以往



相关学者未尝措意的。该文和本书第四部分中“牟宗三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观”一文，都是笔者探讨牟宗三政治社会思想的成果，只不过这两篇文字仍然只是涉及了牟宗三政治社会思想的部分，全面的论述，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与读者见面。第五篇“唐君毅的哲学观——以《哲学概论》为中心”，曾刊于《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是本书中较为晚近的一篇文章。该文以迄今为止唐君毅研究中颇受忽略的唐著《哲学概论》为中心，具体考察了唐君毅的哲学观，恰好可以与晚近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认识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讨论相关联，更与本书第二部分中笔者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省可以彼此呼应。第六篇“当代儒家知识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曾刊于《读书》2007年第1期。该文是中国大陆范围内正式刊发的为数不多的讨论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积奖（John W. Kluge Prize，又称“人文诺贝尔奖”）的文字之一。与人文诺贝尔奖的学术声誉之隆以及海外中文世界的重视相比，大陆正式发表的相关文字之少，实在是不成比例的。笔者的文字不仅在于介绍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消息，更在于借此针对当今学界的问题，反省如何在当今之世做一位真正儒家知识人的问题。以笔者之见，余英时先生正可谓为所有向往成为儒家知识人的广大学者树立了一个典范。虽然人文诺贝尔奖对余先生来说不过是实至名归的自然结果，原未尝在余先生的主观希冀之中，但该奖项颁发给余先生，却恰好可以说是对真正意义上儒家知识人的一种充分肯定。第七篇“儒家的文化自觉与价值立场——陈来《传统与现代》读后”，曾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该文以陈来先生《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2006年的再版为机缘，一方面介绍了该书的内容与观点，另一方面更结合当前所谓“儒学复兴”的现象，对于该书所当具有的意义和启示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尤其触及了文化立场、价值关怀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该文和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儒学复兴的省思——缘由、问题与前瞻”前后呼应，可

以彼此参看。

第四部分“儒家传统的政治哲学资源”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儒学：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曾刊于2002年4月4日第14版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该文一方面介绍了《儒学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一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另一方面更借此机缘表达了笔者对于儒学传统与自由主义以及社群主义之间的关系。依笔者之见，只要是着眼于儒学与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两头相通，而并非在 communitarianism 和 liberalism 彼此相斥情况下的单向求同，那么，“儒家社群主义”和“儒家自由主义”这两种表述，都未必没有其合法性及其自身特殊的含义。并且，在明同别异的前提下展开儒学、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三边的深度互动，无论对于儒学还是当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来说，都会收到相互滋养、彼此取益的效果。第二篇“牟宗三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观”，是本书中笔者最近的一篇文章，曾于2007年底刊于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并出版的《思想与文化》第7辑。该文除了弥补牟宗三研究的一项缺失之外，更在于通过检讨牟宗三关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一套论说，发掘现代儒学中所蕴涵的政治哲学资源。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绝不仅仅只是所谓“心性儒学”，其政治哲学的蕴涵和视角深厚且独到，不仅不与自由主义相抵触，反而可以弥补自由主义的一些缺憾。如今讨论自由主义多囿于现代西方的话语脉络，仅在政治、经济建制的意义上立说，往往无视道德、宗教意义上的自由，更不深究道德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牟宗三论“自由”和“自由主义”，恰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应有关系以及顾此失彼所导致的弊端。第三篇“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最初是提交2006年4月在浙江余姚召开的“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后来收入吴光主编的《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该文首先辨析《原君》文本，论证其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乃针对明代尤其晚明的昏君而



言，其中甚至隐含了承认易代鼎革合法性的思想。而即便抽离具体的历史脉络，《原君》文本的思想在理论层面上也并不构成对君主制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该文指出，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其实当在其《学校》一篇，其中包含的建构公议社会的思想甚至举措，即在今日亦颇有其合理性，其价值不在于以往所谓与西方议会性质近似，而在于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关于“公议”（public reasoning）的思想多有相合之处。依笔者之见，公议社会的建构尤当是如今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缺乏“公议”的社会，恐怕很难臻于真正“和谐”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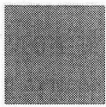
本书所收文字，因时间跨度长达15年（1992~2007），不同时期文字的文笔难免有所差异。尤其是作于90年代初的那篇文章，笔者如今看来甚至不无稚嫩之感。但该文此次收入本书，笔者除了必要的修订之外，文字基本保留了原貌。如此一方面既可保留和见证笔者当时的所思，与后来的文字相较，亦可于笔者相关思想在时光演进中的踪迹略见一斑。此外，若干文字当初发表时有所删节，此次收入本书时不仅恢复了原貌，更对原文重加修订，或于文字有所修饰，或补充了相关的注释。这是要向读者说明的。当然，对于当初发表本书文字的各类出版物，笔者也借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笔者希望在本书导言部分对读者说明的是：对于“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的讨论，可以而且必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几千来中国文化传统尤其价值系统的“儒学”和“中国哲学”；另一个则是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儒学”和“中国哲学”。就回顾与前瞻来说，前一层次的“儒家传统”和“中国哲学”，主要是一个价值的问题，后一层次的“儒家传统”和“中国哲学”，则更多的是一个知识的问题。缺乏这两个层次的分殊，不免会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缠夹。但是，这种分别却不是二者之间“一刀两断”。从儒学发展自身的历史来看，二者从来都是“须臾不可离的”。“儒学”和“中国哲学”在20

世纪成为一门学科以来，迄今海内外不乏“知识化”的担心和批评。作为一种“价值”的“儒家传统”和“中国哲学”，自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不能异化为与自己生命气质无涉的纯粹对象化的知识。但是，这种“生命学问”的养成，又从来都离不开理性的陶冶。孔子在《论语》中首举“学而时习之”示人，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以“好学”而非一般的“忠信”来自我界定，可见“学”之重要。正如古代所有大儒在“躬行实践”的同时都无不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一样，当今认同儒家核心价值者，也不应当自外于知识界和学院体制。那种将传统和现代、实践和理论一刀两断，认为儒家只能和“传统”、“实践”相关而与“现代”、“理论”无缘，甚至认为现代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建制与儒家必不相容的看法，实在是对儒学发展的历史缺乏了解以及思考力薄弱两方面所致的皮相之见，难免似是而非。在当下这个众口喧腾、网络和各种媒体足以让人产生“天涯若比邻”之感的多元与多变的世界中，真正儒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关怀反倒需要坚实的学术研究作为基础。是否具有真正儒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关怀，并不在于是否从事儒学名义下的各种社会活动，更不在于是否终日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摇旗呐喊。反倒那些沉潜于纯学术研究而对各种问题不是动辄发表意见的人文学者，才真正具有坚定的文化立场与深切的价值关怀。也正由于此，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方能源源不断。现代的儒家知识人如牟宗三、余英时先生等，正是这种将强烈的政治、社会关怀建立于深厚学术素养基础之上的典范。事实上，“尊德性”与“道问学”恰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实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合则两美，离则两伤。从以往历代大儒到当今儒家知识人的真正代表，无不是德性与理性交相滋养，价值与知识相得益彰。其所成就者之所以能够“终久大”，端赖于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价值关怀相互支援、有机结合，既避免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知识从业员“没有心肝”，又避免晚明王学末流学养未逮而误以“情识”为“良知”的感性挥洒和气魄承



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要想不断推陈出新、生机勃勃，作为一种智慧和文明的源头活水而为全人类取用不竭，必须始终保持价值与知识之间的动态平衡，立足于二者之间统合与整全的发展。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定位

一 儒学复兴的省思——缘由、问题与前瞻	(3)
二 为道与为学——当代儒者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定位	(11)
三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建构	(17)
四 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 21 世纪的儒学	(36)
五 宗教对话：儒学第三期开展的核心课题	(47)

第二部分 方法与成果的检讨

一 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 与前瞻	(73)
二 中国哲学研究的三个自觉——以《有无之境》为例	(83)
三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 两种模式	(105)
四 20 世纪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26)
五 当代中国的阳明学研究：1930 ~ 2003	(137)



第三部分 当代儒学的课题与人物

- 一 道德与知识：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发生学解说 (169)
- 二 以史证“经”与以史证“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 (191)
- 三 牟宗三哲学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概念——从中国哲学自身演进的视角来看 (203)
- 四 牟宗三早年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 (219)
- 五 唐君毅的哲学观——以《哲学概论》为中心 (289)
- 六 当代儒家知识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荣获人文诺贝尔奖的启示 (308)
- 七 儒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关怀——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读后 (317)

第四部分 儒家传统的政治哲学资源

- 一 儒学：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 (327)
 - 二 牟宗三的“自由”与“自由主义”观 (333)
 - 三 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 (355)
- 参考文献 (373)